

1938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战时节约问题的大讨论^{*}

孙钦梅

内容提要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出把“厉行节约”作为非常时期七大经济方针之一，并颁布经国民参政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节约运动计划大纲》，决定推行全民节约运动，以解决国家战时经济危机。这一重要举措备受社会舆论关注。经济节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研究范畴，更在中国经济学界引发一场大讨论。围绕战时实行节约的必要性、战时节约的原则与范围、统制物价于战时节约的重要性等方面，以马寅初、刘大钧、伍启元、曹立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者展开了激烈深入的讨论，尝试为解决中国战时经济问题寻求方案。他们的意见极具针对性和批评性，由此遭到推行者的反驳和质疑，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经济决策，为当局所吸纳和运用。这场论争的始末也勾勒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群体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演变图式。

关键词 全民族抗战 节约运动 马寅初 经济统制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财政经济“种种困难倍蓰曩日”，^①推行节约运动以汲取国内一切物力财力用于抗战，成为国民党内部高层的共识。1938年7月，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书》中坦言：“现在抗战已经一年了，今后战局将更持久，更艰苦”，“我们后方同胞工作，要特别紧张，生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节约运动与新中国国家建设研究（1949—1965）”（项目号：17BDJ049）阶段性成果。

① 《非常时期经济方案》（1938年3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411页。

活要极端节约”。^①同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节约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节约运动计划大纲》，决定在全国推行“彻底”的节约运动，^②并通令全国切实奉行，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节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更在中国经济学界引发热烈讨论，以马寅初、刘大钧、伍启元、曹立瀛、丁洪范等为代表的近代经济学者，尝试运用经济学理论为解决中国战时经济危机寻求方案。他们的节约观点在许多方面与政府的节约主张并不一致，甚至呈矛盾和对抗之势，这就使战时节约理论在“政”“学”之间产生了论争。尽管如此，经济学话语下的节约理论又在一定程度上被节约运动推行者采纳和吸收，成为政府制定种种节约运动方案和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参考价值。

但这场围绕战时节约问题的大讨论，学术界至今未有呈现，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或“政府”视角下战时节约运动的具体开展过程，^③对节约“理论”以及“社会”层面的节约认知缺乏关注，其中许多重要问题也迄未触及或予以深究。通过对民国时期报刊以及档案、专题图书等相关文献资料的检视，本文意在历史地呈现这场大讨论的发生过程及其影响。从知识分子群体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形态角度来说，这场大讨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知识精英对国民政府何以从合作支持走向疏离对抗。

一 “节约救国”：战时节约政策的制定与出台

1938年国民党中央颁行《抗战建国纲领》，表示在“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绝续之交”，要“负救国建国之重大使命”。^④但“现代国家之构成，财为

① 《蒋委员长“七七”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讲演词》，《河南省政府公报》1938年第2260期。

② 国民政府1930年已开始发起节约运动，1933年在南京成立节约救国会，使“节约救国”成为当时的盛行理念，但开展效果并不明显。此次节约运动可视为战前节约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抑或是“扩大的节约运动”。

③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方霞《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的节约建国储蓄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王京强：《张雪岩与抗战时期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程龙刚、周劲：《贡井盐场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纪实》，《四川档案》2012年第4期；孙钦梅：《国民政府时期的节约运动与国家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孙钦梅：《抗战时期节约运动述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1期。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权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第6页。

其中心；而现代战争之推进，财为其动力”。^① 时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长的晏阳初指出，“这次抗战要取得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条件是能持久；而抗战能否持久，不单靠前方的武力，更须赖后方的充实”。^② 然资料显示，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中国各银行存款不过40亿元左右，而美国则达520亿元，日本也有150亿元之多，中日之间的差距不可谓不明显。^③ 英国财政部派来协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称：“中国财政可支持六个月。”^④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自1938年已正式通过国民节约运动计划，“要日本的国民节衣节食来储蓄80亿圆以供日阀侵略中国军事的消费”。为达成这一目标，日本当局一面极力鼓吹节约消费，一面奖励民间储蓄，并视之为战时经济的核心国策。^⑤ 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决定推行全民节约运动，“以加强抗战建国的整个力量”。^⑥

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举国人民，当以极端之节约，极端之刻苦，以从事于生产资本之累积，与产业之振兴”。^⑦ 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并将“厉行节约以省财力”作为非常时期的七大经济方针之一。^⑧ 此后，战时节约运动开始酝酿。6月1日召开的汉口金融会议对于节约储蓄大为注意，在其决议案中，“提倡节约、奖励储蓄”为要项之一。^⑨ 6月25日，行政院重申1934年制定的《公务人员革除婚丧寿宴浪费暂行规程》，强调公务人员“应共体艰难，戒绝浮奢”。^⑩ 6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公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军人或公务员不得克扣军饷、舞弊军用品等，否则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⑪ 7月7日，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书》中重申：“我们国家要支持抗战，必须实

① 《节约储蓄宜速厉行》，《申报》（汉口）1938年7月31日。

② 蒋伟鄂：《抗战时期平教会的农民抗战教育》，《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③ 朱炳南：《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国民图书出版社，1940，第4页。

④ 饶荣春：《中国战时财政问题检讨》，《时代批评》第3卷第53期，1940年。

⑤ 符涤尘：《战时日本的节约储蓄运动》，《财政评论》第1卷第4期，1939年。

⑥ 《战时节约办法》，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上），重庆出版社，2014，第121页。

⑦ 《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宣言》（1938年4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第411页。

⑧ 《非常时期经济方案》（1938年3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8—9页。

⑨ 《金融会议孔院长训词》，《经济动员》1938年第1期。

⑩ 《行政院再申革除浪费规程》，《工商日报》（西安）1938年7月11日。

⑪ 《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金融经济月刊》第2卷第2期，1938年。

行极端的节约。”^①节约运动至此开始着手进行。

此后，中央政治委员会召集财政、经济、法制等各专门委员会数度研讨，拟成《节约运动计划大纲》。是时新成立的国民参政会^②在汉口开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将该大纲交付国民参政会第一期集会讨论。7月11日，国民参政会开始讨论该案，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出席，说明政府提倡节约运动之用意，并做补充报告，“各参政员对此一致表示热烈赞同，且愿协助进行，尤望公务人员以身作则，切实实行，并分别提出修正意见”，^③后经大会议决通过。7月26日，蒋介石发表了一份名为“党政人员厉行节约”的通电，要求全国党政人员厉行节约，“一切衣食住行之生活，务循简单朴素之原则”。^④9月29日，国民政府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95次会议正式颁行《节约运动计划大纲》，通令全国切实奉行。

根据计划大纲，推行节约运动的目的是增加抗战力量和养成国民俭朴风气。实施原则分生产节约和消费节约两个方面。实施方法分统制、禁止、劝导、奖励、竞赛五种。实施项目分四大类，第一类以农工商生产部门为主体，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商业三方面的节约；第二类以机关为主体，包括公务机关、社会法团的节约；第三类以个人为主体，包括日常生活之节约、社交娱乐之节约；第四类以物品为主体，包括粮食、汽油煤油、纸张、入口奢侈品、军需品、军用物品及旧衣之节约。其中，个人节约方面，规定节约烟酒消费，尤以洋烟洋酒为要，可课以特别消费税；禁止妇女擦粉涂脂及服用不需要之衣饰；禁止跳舞及淫乐性之戏剧影片；等等。吸收社会资金及其运用方法则分两种：一是创立节约建国储金；二是劝购公债。在推行办法及组织上，规定在中央由中央党部会同新生活运动总会、国民经济建设总会组织节约运动总会主持全国节约事项，以此类推至各省、县市，分别成立相应分会、支会。各级政府机关及社会法团分别成立节约运动委员会，主持各该机关或法团之节约运动事项。^⑤根据计划大纲要求，11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节约建国储金条例》，旨在“促进国民节约，

① 《蒋委员长告全国军民书》，《时事半月刊》第1卷第19期，1938年。

② 国民参政会虽是一个咨询性机关，但在初期因为有毛泽东、林伯渠等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的参与，在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民族抗战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③ 《中央推行节约运动》，《国华报》1938年7月13日。

④ 《蒋委员长告诫党政人员厉行节约》，孟锦华编著《节约与抗战建国》，浙江省抗日自卫委员会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印发，1938，前言页。

⑤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上），第116—121页。

奖励储蓄，与兴办建国事业”。^① 12月1日，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又通过《节约运动总会组织大纲》。^② 此外，社会部还制定了“限制酒食消费运动”及“禁止党政军人员宴会”几项办法，并拟制定《战时生活纲要及实施方案草案》《战时生活推行办法草案》《推行战时生活运动暂行办法草案》《战时取缔奢侈行为办法草案》等规定。与计划大纲一道，它们的联合出台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战时节约运动实施的总体规制。^③

计划大纲的制定与出台是政府行为，但“节约”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又要依据和参考经济理论。实际上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经济学界围绕战时节约的讨论已在进行。1936年马寅初在《非常时期的经济问题》一文中指出，战时通过民间自动节约的方式已不可取，必须实行统制。统制方法主要有加税和定量分配两项，对军需品及制作之材料，战时应以加税之方法制止之，对汽油等我国最紧缺之物资，虽加重税，有钱阶级仍可任意购买消耗，故应加以限制。^④ 对于如何筹措战费等问题，他认为中西税收制度不同，中国旧税已经非常沉重，不宜加税，可以新增加转口税与战时盈利税。在募集内外债方面，以前国内债多在上海募集，但现在上海沦为战区，不适宜募集内债，但可以大量募集外债。在增发纸币方面，应当采取有限增发货币的政策，不可滥发。^⑤ 刘大钧也指出战时应采用经济统制政策，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上，对合于我国经济发展者如工业机械及原料应奖励其输入，奢侈品之输入则应加取缔。^⑥ 也有一些经济学者强调以通货膨胀政策应对长期抗战。张素民即认为战时应实行有限的通货膨胀方案。但他也指出增发钞票这项方案“亦殊危险”，“仅应容许法币之相当膨胀”，长期战争时还必须同时实行所得税率加倍、举办遗产税、征收奢侈税等新租税政策。^⑦ 斯继唐同样认为长期抗战非先施行通货膨胀政策不可，否则绝无负担战费之力量。但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并非单纯用印刷机滥发钞票，而是要以通货膨胀为主，以统制资金、外汇和物价为辅。^⑧ 也有一些经济学者反对在战时采用

① 邹宗伊：《中国战时金融管制》，财政评论社，1943，第345页。

② 《节约运动总会组织大纲》，《中央周刊》第1卷第35期，1939年。

③ 独立出版社编《抗战法令续编》，独立出版社，1939，第29—32页。

④ 马寅初：《非常时期的经济问题》，《空军》1936年第180期。

⑤ 马寅初：《战时财政问题：庐山谈话会经济组同人关于战时财政与金融之意见》，《中外经济拔萃》第1卷第11期，1937年。

⑥ 刘大钧：《中国今后应采之经济统制政策》，《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

⑦ 张素民：《中国战时财政方案》，《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19号，1937年。

⑧ 斯继唐：《长期抗战的财政途径》，《中外经济拔萃》第1卷第11期，1937年。

通货膨胀政策，指出所谓“限制的通货膨胀”只能在平时做到，战争爆发后因巨额战费的支出以及没有充足的准备金可以作为合法的增加钞票发行，恶性通货膨胀无可避免。^① 经济学家的战时经济节约思想理论随着中国抗战局势的发展逐步深入和体系化，也更具有可操作性，不少主张被国民政府听取和吸纳，转化为政府战时节约方案的重要内容。

在制定颁布节约运动纲领政策的同时，武汉、重庆、广东、甘肃、浙江等多个省市相继成立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武汉由新军总会、政治部、省市政府合组武汉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主持节约运动。7月21日，该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当场一致通过《武汉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初步实施方案》。^② 重庆市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等于8月11日发起成立后，制定《重庆市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初步实施方案》，在政府节约办法颁布前先行初步推动。^③ 8月17日，广东省成立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推选第四战区政治部、省新运会、省党部、省政府、市政府、女界联合会等机关团体为该会常务委员，并制定战时节约实施办法。^④ 海外侨胞也开始推行华侨节约运动，侨务委员会的通令称：“现查节约运动为我国目前要务，华侨节约贡献祖国，又极有利于外汇及祖国经济前途，节约大纲业已公布，侨胞尽可在不背原则下，参酌当地情形，极力推行。”^⑤

报刊界也纷纷发起厉行节约的舆论宣传，乃至于一时间“节约”的口号盛行。《东方杂志》《申报》《大公报》《新运导刊》《经济动员》等国内报刊均围绕节约问题大幅刊载文章。《新运导报》刊文称：“由党政当局提倡节约运动以后，重庆各报，均著论鼓吹。”^⑥ 《申报》连续发文称：“国府颁令，实施节约运动，这是国难期中应有的举动。”^⑦ “节约运动能否彻底，与抗战建国前途，有莫大关系，此全国国民所当深刻认识也。”^⑧ 《东方杂

① 《中国战时财政问题：光华大学战时经济座谈会》，《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9期，1936年。

② 《各界节约会昨开会 通过初步实施方案 切实发动各界努力推行 造成检朴刻苦的新风气》，《申报》（汉口）1938年7月22日。

③ 《重庆市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成立大会记录》《重庆市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组织简则》《重庆市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初步实施方案》，《新运导报》1938年第18期。

④ 《战时节约运动实施办法》，《新运导报》1938年第19期。

⑤ 《海外侨胞推行节约 增加战时经济力量 参酌环境极力推行》，《申报》1939年1月26日。

⑥ 朱通九：《节约运动的检讨》，《新运导报》1938年第18期。

⑦ 昔：《实施节约运动》，《申报》（香港）1938年10月11日。

⑧ 《中枢两周年纪念周林主席勉国人厉行刻苦节约》，《申报》（汉口）1938年7月14日。

志》报道称：“国家入于战争状态，欲求最后之胜利，国民经济生活须行节约，此为不可避免之事。”^① 报刊界的大力宣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节约运动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力。

二 大讨论：经济学话语下的战时节约理论

节约问题是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范畴，1938年国民政府一系列节约政策的制定出台以及舆论对节约运动的大力宣传，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在这次关于战时经济节约的大讨论中，马寅初、刘大钧、伍启元、曹立瀛、丁洪范、周伯棣等近代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均参与其中。讨论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

第一，战时实行节约的必要性。经济学界关于节约的主张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分歧，或主张节约，或主张消费，但至战时基本达成共识，即肯定非常时期政府实行节约的合理性、正当性以及重要意义。曹立瀛在《战时经济节约》一文中指出，“经济节约是战时重要经济政策之一”。但他同时指出，因时空与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各国经济背景不同和战时环境互异，节约也应有不同的方案。^② 侯树彤认为节约运动关系“民族抗战与建国的前途，决不是一件小事”，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独立与生存”。^③ 伍启元在《论战时节约》中论证了战时实行节约的必要性，认为战时经济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支持战争这种巨大的额外消费，其办法有四点：增加生产，动用国民资本，节约消费，向外借债。在战时增加生产困难重重，动用国民资本也有很多的害处，所以“除了向外借款，节约应该是我国应付战争支出主要方法”。^④ 马寅初做了进一步论述，指出节约要视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情形而定，战时与战后一二十年应讲节约，平时则不应讲节约。在战时国民对于物力资力的消耗应减少至最低限度，使国家的需求得到最大可能的满足，例如水泥、钢筋、木材等在平时为建筑中的重要材料，“一到战时，则必须优先供国家使用”。战争结束后五年或十年之内，仍要继续实行节约，因国防建设仍须积极推进。至于平时则不必讲求极端节约，“倘极端节约，

① 《我国战时节约运动》，《东方杂志》第35卷第17号，1938年。

② 曹立瀛：《战时经济节约》，《经济动员》1938年第5期。

③ 侯树彤：《关于节约运动几点理论的解释》，《新运导报》1938年第19期。

④ 伍启元：《论战时节约》，《新民族》第2卷第6期，1938年。

反易招致经济恐慌，与吾人之期望背道而驰”，“倘节约多，即国民之储蓄富。此种丰宽之储蓄，非转投于工农生产事业，不能发挥储蓄之效用”。^①

第二，节约的原则和统制消费的限度。这是讨论中经济学家关注的重心。曹立瀛指出，战时经济节约“须有确定的原则”，“全部方案不是能随便施行的，首先固须彻底了解经济节约的原则、方式、方法与范围”。对于节约的总原则，他指出抗战的现阶段中节约应当以国民经济为对象，而不以个人经济为对象。原因是个人的生活提高与财富增加未必是全国的生活提高与财富增加。以此原则为基础，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分原则：（1）节约应不妨碍生产能力；（2）节约须不妨碍资财流转；（3）节约须不妨碍国民生计；（4）节约须不妨碍国民健康。^② 伍启元在分析战时实行节约的范围问题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政府。他指出不必对一切物品的消费都加以限制，只要对一部分的消费加以节约便可以达到所预期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可遵循两个原则：（1）凡是与军需品有关的物品，如汽油和制造军火的原料，都应该节约；（2）凡是与国际贸易商品（特别是进口货）有关的物品，都应该节约。除了这两类物品，其他消费都没有节约的必要。他批评“最近谈论节约的人或推行节约运动的人因为不理解这一点，所以对许多有害无益的节约也在努力地提倡”，如倡导“不坐人力车”之类，这种节约便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倘使大家不坐人力车，人力车夫便会失业，便引起了社会的严重问题”。对于那些希望从女人的头发、手臂、衣服等细节中去推行节约运动的做法，他认为“更是无理取闹”。^③ 丁洪范也指出战时节约需要同时兼顾的两个原则：（1）节约应与生产及兵役等平行开展；（2）节约应与课税、募捐、募债、强制储蓄等平行推动。他主张与其“禁止”妇女烫发，不如对之课以重税。^④ 刘不同认为“节约之范围必使其有利于战时财政及战时经济，否则即违反战时节约之意义”。他举例说，劝人民节用汽油，国家能以廉价购而供军用，这符合战时节约原理，但如果禁止人民饮茶，势必有害茶业的发展，并会影响农民生活及一般国民经济，而战时财政也必然受其影响，此种节约与自杀政策无异。由此他指出战时节约之最高原则有

① 马寅初：《统制物价为节约运动与长期抗战之先决问题》，《四川经济月刊》第10、11卷第6期，1938年。

② 曹立瀛：《战时经济节约》，《经济动员》1938年第5期。

③ 伍启元：《论战时节约》，《新民族》第2卷第6期，1938年。

④ 丁洪范：《战时节约的理论与实践》《战时节约的理论与实践（续）》，《经济动员》1938年第6期。

三：（1）务使其不得损及生产事业；（2）军用品必须列为节约品；（3）舶来品与自给不足之品必须列为节约品。^① 对于节约的原则范围，侯树彤认为如果确属必须节约的事物，“纵因此而引起某一部分工人失业或陷某一种产业于不景气，亦在所不惜”。^②

统制消费是战时节约的重要内容。对于统制消费的方式与限度，刘大钧指出战时各种物品之用途及来源，彼此各不相同，因此统制消费的方式不能一致，即统制消费限度，应有高下之别，需要按照各种物品的用途采用不同的方式与限度。比如军用物料同时亦为生产事业与私人所消费者，如钢铁、电料等，应采取优先统制办法，优先供给军用，如有多余可供生产事业，而人民消费则应绝对限制。一般消费物品虽不能一一加以统制，但应采取征税方式减少其消费。^③

第三，统制物价与节约。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内物价迅速高涨，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物价高涨对于推行节约运动的不利影响，呼吁政府实行物价统制。沈桂祥指出，“物价高涨，是使节约运动难以推行”，“设物价腾贵，则人民维持生活，尚且不易，何节之有”。^④ 马寅初指出，实行节约“非先统制物价不可”。他说：“现在节约运动，不可专从节约二字着想，必须扩大视线，从物质统制上着想，凡较能得节约之实效。”在此基础上，他重点论述了统制物价于节约抗战的重要性，认为战时物价飞涨“不但使人民之生活程度自然降低，并可使勤勉积蓄的人失望，以为过去辛苦储蓄的结果，购买力反因之大减，反不如尽量消费之为得计。如是不但不能获得节约运动的效果，国民固有的勤俭美德或风纪，亦将破坏无余。故物价不可不先行统制”。他认为中国应借鉴欧美国家由政府物价实行全盘统制，“不偏于一隅，使私人无操纵之机会”。^⑤ 周伯棣持相同观点，他在《论战时的物价统制》一文中指出，“由物价腾贵而来的节约作用，能使资产阶级节俭化，中产阶级贫乏化，无产阶级虚弱化”，必须制定物价政策对物价加以统制：一方面，须侧重于平民最低限度的生活的维持，不可使物价高涨损害到平民的生活；另一方面，须侧重于军事上的需要，不可使物价腾贵而军需品亦复随之腾贵，宁可使生产者或中间商少赚些钱，不可使国家财政

① 刘不同：《论战时节约与税收》，《东方杂志》第36卷第6号，1939年。

② 侯树彤：《关于节约运动几点理论的解释》，《新运导报》1938年第19期。

③ 刘大钧：《统制消费》，《经济动员》1938年第6期。

④ 沈桂祥：《战时物价统制与消费合作》，《经济动员》第3卷第2、3期，1939年。

⑤ 马寅初：《统制物价为节约运动与长期抗战之先决问题》，《新运导报》1939年第22期。

的支出做无谓的膨胀。他还建议设立物价委员会专司其事，“以便随时随地，对于物价作合理的调整”。^①

在关于统制物价的后续讨论中，也有一些经济学家阐释了节约消费对于救济和防止物价高涨的“治本作用”。如蔡次薛提出，提倡节约是“调节物价的根本方法”。^②曹立瀛认为，节约消费就是减少需要，需要减少到市场能供给甚至供给有剩余时，物价自然降落，“于是可知节约运动，不仅可以储备物资以供战争需要，还可以平衡高涨的物价”。^③褚一飞也提出将强制节约作为统制物价“治本方面”的重要内容：一切生活所必需之奢侈品禁止输入，并禁止商店出售；改变消费习惯，采用强制定量制，采用购买许可制；等等。^④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侵略使“节约救国”“节约建国”具有强有力的话语权和合法性基础。但也有一些经济学者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强调节约对经济不利。1935年董时进即在《反俭朴论》一文中指出，俭朴只是个人兴家立业的手段，并非整个社会繁荣进化的大计，所谓节约运动“只怕结果无益反而有害”。^⑤1937年他在《节约运动的真谛》一文中又指出，“交战时期，人力物力都须尽量用在军事上”，“此时非缩减消费，则物品难于接济”，但这“在经济上是不利的”。他批评了“节约可增加资本储蓄、发展生产”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持有者“犯了将个人经济原理用到社会经济的毛病”。他驳斥了“节约日常费可充实国防”的看法，认为筹款最可靠的办法在于政府税收，实行节约只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他还抨击了政府“开源节流”的节约思想，认为“社会上的金钱是和地球面上的雨水一样，必须川流不息”。^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经济学界对战时实行节约的必要性逐渐达成共识，且讨论的重点转为战时节约的具体办法、节约的限度以及统制物价防止通货膨胀等问题。而中国战时经济问题也引起国外经济学者的关注，如日本经济学者木村增太郎发表《论中国统制经济》《关于物价问题》《论通货与物价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对中国的战时经济统制、节约储

① 周伯棣：《论战时的物价统制》，《东方杂志》第35卷第18号，1938年。

② 蔡次薛：《我国现阶段的物价问题》，《东方杂志》第36卷第13号，1939年。

③ 曹立瀛：《战时平衡物价问题》，《经济动员》第3卷第2—3期，1939年。

④ 褚一飞：《战时物价统制问题》，《财政评论》第4卷第4期，1940年。

⑤ 董时进：《反俭朴论》，《江西农讯》第1卷第11期，1935年；《反俭朴论》，《江西农讯》第1卷第13期，1935年。

⑥ 董时进：《节约运动的真谛》，《国闻周报》第14卷第3期，1937年。

蓄、物价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分析，宣称中国实行经济统制应由民间组织如同业公会负责进行，而不要由政府去干涉。^① 广濑库太郎在《中国之物价问题》中针对中国政府发行储蓄券收缩通货的做法表示，中国以通货收缩安定物价应有限度，否则会使经济活动停滞，逐步抑制物价的有效方法是合理地统制通货之增发和恢复工业生产。^② 也有西方经济学者在对当时中国的通货政策和财政情形进行分析后认为，征收所得税、遗产税及利得税等新税对于中国的战时需要作用甚微，中国政府推行的公债政策则成效显著。^③

三 反驳与吸纳：政府高层的回应

经济学者尤其是曹立瀛、伍启元的节约理论观点，对节约运动的推行者来说在很多方面形成了极具针对性的批评意见，也由此引来他们的反驳。1938年9月、10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办的政治刊物《新运导报》^④连续推出“节约运动特辑”和“节约宣传特辑”，刊登林森、陈立夫、张群等一大批国民党高官及新生活运动领导人章楚等关于节约运动的宣传言论以及节约运动工作报告，其用意在于为推行节约运动造势，同时反驳一些经济学者以及社会上对于节约运动的批评言论。

章楚在《论误解节约运动者之观点》一文中正面回应称：“在全国上下，大声疾呼，要求厉行节约运动的今日，有少数‘经济学专家’站在纯经济学的立场上，发表辉煌巨论，以供‘从事这种运动者之参考’。我们觉得对于他们的诚恳，要表示十二分的感谢。”但他提醒经济学家们在发表文章时注意两点：“第一，批评必须根据事实，若妄加訾议，不明事理，无异隔靴搔痒。第二，立论必须切合当前的环境，若生吞活剥的搬弄一些书本上的原理来，在课堂上则差堪应付；在社会上则要不一定会适合。”^⑤ 章楚进一步从几个方面进行批驳。第一，他指出那种持“个人经济与国家经济不同，‘成家’的节俭与‘建国’的节约没有关系”理论的人“根本就沒

① [日] 木村增太郎：《论通货与物价问题》，《新闻月报》第1卷第1期，1945年。

② [日] 广濑库太郎：《中国之物价问题》，《新闻月报》第1卷第2期，1945年。

③ N. Young：《中国战时之财政金融阵线》，《财政评论》第3卷第3期，1940年。

④ 原名《新运月刊》，1937年1月在南京创刊，半月刊，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辑发行，1948年10月停刊，共发行122期。

⑤ 章楚：《论误解节约运动者之观点》，《新运导报》1938年第19期。

有了推行节约运动者的立场和方法”。他指出，以节约取得贡献国家，就是将个人的财富变成国家的财富，将节约所剩余下来的金钱供给国家购买关于军事上需要的物品，加强抗战的力量。第二，驳斥伍启元等人“除军需用品以外，一般社会上普遍消费，不必需要节约，否则会造成失业”的理论，认为这种观点只是“拘泥着经济学原理，而尚没有充分了解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结构和现状”。因为失业问题虽在欧美各国发生，但是就当时的中国情形而论，由于沦陷区域的扩大，即使社会上普遍实行节约，也断不会出现失业问题，更不会造成失业恐慌。第三，对“节约运动推行内容过于琐碎，而与抗战前途无关”的说法进行反驳。针对备受争议的“女子烫发”问题，他反驳道：“细阅重庆市和武汉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实施方案中，并没有取缔妇女奇装烫发几点，取缔妇女奇装烫发者，并非节约运动会，且另有立场，亦非以节约问题为根据的。”

国民政府官员也纷纷发表文章或举行演讲，从不同角度阐释战时政府推行节约运动的合法性。如林森宣称：“我们为适应这非常时期的需要，为保持军需品的源源供给，增进输出，减少入超，安定汇价，一方面自然要积极增加生产，一方面又必须厉行节约，相辅而行才能达到目的。”^① 孔祥熙表示“节约运动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种运动，对内足以充实抗战建国的实力，对外可以打破敌人封锁的阴谋，建设自给自足的现代国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运动，实是一种政治的运动”。^② 张群从经济的角度强调节约对于充实抗战资源、提高战斗精神、肃正国家纪纲的重要意义，呼吁海内外同胞“痛念国难严重，尽量节约”。^③ 武汉各界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并“敦请蒋夫人，汪副总裁，冯副委员长等，轮流广播讲演，以促国人注意”。励志社也特地制作大批宣传节约的幻灯片，在武汉市各影戏院放映。^④

经济学家关于战时节约的讨论，在不少方面对节约运动的推行政策提出了异议，遭到节约运动推行者的质疑和指责，但他们的初衷是贯彻自己的学理主张，为战时节约运动的开展和战时经济建言献策。在抗战形势日益危重的情况下，他们所提出的意见引起国民党高层的重视，并影响政府决策。例如，马寅初等大力呼吁政府在开展节约运动的同时必须首先实行

① 林森：《厉行节约以增强抗战力量》，《新运导报》1938年第19期。

② 孔祥熙：《充实抗战建国力量厉行节约运动》，《新运导报》1938年第19期。

③ 张群：《从节约到生产》，《新运导报》1938年第19期。

④ 《推行节约组宣传劝导等队》，《申报》（汉口）1938年7月29日。

“统制物价”的政策，在当时即有很大意义。节约运动在之后的开展，尤其体现在“节约建国储蓄运动”中，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即是物价的飞涨，足以印证这一点。在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国民政府开始制定战时物价统制措施以应对经济危机。自1938年11月起，中央经济部先后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及《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取缔投机操纵办法》等有关评定物价的条例及法令，并特令各地县政府组织物价评定委员会，审定物价。1939年4月25日，重庆市正式成立评定物价委员会。昆明因米价暴涨，也特设粮食管理处，平抑米价。^①1939年12月，经济部又专门成立“平价购销处”，同时与军政、交通等部门联合成立各相关行业的管理委员会，以办理平价购销事宜。其中，评定物价委员会的设立与经济学家的提议也颇为一致。至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国民政府推出以“增加生产、稳定物价、节约消费、调节金融”为目标的战时经济政策。^②1939年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后，对政府某些节约政策持批评言论的伍启元也受到政府委托，设计“物价统制”方案。此外，刘大钧等提出的消费统制主张也被政府吸收和采纳。^③与此同时，经济学者的战时节约主张也成为政府宣传和推广节约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一些文化教育团体和政府宣传机关出版的一批专门的抗战宣传丛书，如国民月会讲述材料《战时节约论》^④《战时节约》^⑤、抗战义刊《战时节约论》^⑥、浙江省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编印的《节约与抗战建国》，皆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经济学家战时节约理论的要点和精髓。

但经济学者就节约问题所提出的一些合理建议，并非都能得到政府的认同或采纳。如经济学界曾提出，在通货急剧膨胀下“节约建国储蓄运动”推行如继续按照原存储面额偿付，对储户来说太不公允，呼吁政府制定一个战前储蓄存款放款的合理清偿办法。但国民政府《银行业战前存款放款清偿条例》出台后，舆论哗然，因为按照这个条例执行，所有储户的利益均会遭受重大损失，而官僚资本家却借机大发横财。对于官僚资本借节约

① 朱通九：《上海重庆昆明日用零售物价上涨速度之比较》，《经济动员》第3卷第2、3期，1939年。

② 宣传部：《国民政府的战时体制》，中央书报发行所，1943，第78页。

③ 丁洪范：《战时节约的理论及实施（续）》，《经济动员》1938年第6期。

④ 《战时节约论》，重庆市政府、重庆市动员委员会，1939。

⑤ 《战时节约》，国民精神总动员出版，福建省党部翻印，1939。

⑥ 王适：《战时节约论》，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

运动勒索和垄断的行为，马寅初猛烈抨击称：“我们的抗战，中等人出钱，下等人出力，至于有钱的上等人呢？既未出钱，又未出力，反而发了国难财。”^① 伍启元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由于物价变动，不但有钱出钱的原则无法实现，而且引起了‘有钱得钱，无钱出钱’的不平现象。”^② 在“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后期推行过程中，国民政府不断出台“强制储蓄办法”和劝储办法，在此政策和政府严格考核的压力下，地方官员和执行者常常不惜以各种方式强迫民众参储，甚至出现拦路劝募、硬性摊派的现象，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四 余论

客观地说，以马寅初为代表的近代经济学者作为“后五四知识分子”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拥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独立的学术见解、批评精神，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救世情怀，既为追求知识真理和价值理念而存在，也是所在社会的谏言者和批评者。面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难深重的局势，他们坚持“学术救国”“经济救国”，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战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很多矫正或建设性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服务于非常时期的“战时经济学”，^③ 其政治经济影响不容小觑。在这场关于战时经济节约的大讨论中，他们关于经济节约的认识颇有见地，往往能切中时弊，其理论主张无论在制定经济节约的原则、限制节约消费的范围，还是统制物价方面，都适应了非常时期国家战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国民政府节约政策制定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但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近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毕竟来自西方，而且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再加上中西国情存在差异，使经济学话语下的节约理论在中国实践极具复杂性。实行节约实际上是政治的经济的问题，而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学家的节约消费、统制消费理论，其推行成功须以强有力、廉洁高效、为民服务的政府为根本政治前提，而这却是国民政府所不具备的。正如美国学者易劳逸所言，国民党政权在1936年以

① 《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货币》，《马寅初全集》第1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201页。

② 伍启元：《当前的物价问题》，商务印书馆，1943，第12页。

③ 《抗战时期经济的重要性及中国战时经济政策》（1944年），《王亚南文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第379页。

后，在争取民众的支持方面一度取得成功，但它的行政机构是无效率和腐败的。^①在这样的条件下，国民政府节约消费、统制消费的范围越广，问题就越多。又如，曹立瀛等经济学家提出节约消费可以抑制物价高涨，但国民政府为求弥补财政赤字滥发纸币，使恶性通货膨胀成为无法医治的痼疾，节约储蓄所取得的成效大部分被抵消，人民因此受到极大伤害，官僚资本却借此壮大，国家范围内的财富流向少数人手中。可见，在战时开展节约运动虽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由于国民党政权无法克服自身腐败和体制性问题，运动难以发挥出自身应有的能量，经济学家关于节约抗战、节约消费以平抑物价的理想也就成为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空想。

由这次大讨论还可以看出，总体而言，20世纪4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与国民政府保持了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他们对政府节约政策的不同观点或批评更多是从学理出发，尝试利用自己的学识帮助政府解决战时经济危机。国民政府对经济学家的意见也颇为重视。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大批专家商讨国是，重点讨论战时财政与金融问题，后来国民政府开征所得税、发行救国公债并积极寻求外债等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经济学家在此次会上提出的建议。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尝试实行“专家政治”，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被国民政府延揽进入政坛，不少人担任要职，在当时甚至形成所谓“学者从政”的浪潮，全民族抗战初期这种潮流达至顶峰。马寅初即长期任职立法院，何廉也在行政院供职，二人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与经济部农本局保持着密切联系。尽管他们所持理论的政治前提是为国家服务，但他们绝不是为做官而做官。体现在战时经济节约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因所在的部门职务而放弃自己独立的学术主张及对局势的客观判断，往往同时以纯粹的“专家”姿态对政府的节约理论做严谨分析，甚至做“消极的批评”，直接指出政府节约政策的弊端。

然至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官僚体制弊端的不断暴露和社会政治生态的日益恶劣，改变了知识精英的观念和心态，许多人“心灰意冷”，开始与国民党政权疏离或者淡出政界。马寅初对以孔宋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家凭借垄断的权力大发国难财进行了尖锐抨击，并多次撰文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

^① [美]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前言第8页。

者开征临时财产税以充实战后经费，^① 由此遭到国民政府逮捕软禁。伍启元也大力呼吁把体现“社会正义”作为讨论物价问题的最高原则，希望通过加强对富人的征税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避免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但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现实社会与伍启元的“社会正义”的主张背道而驰，物价问题最终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之后，蒋介石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不顾一切发动内战，迅速失去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① 参见马寅初《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时事类编》1940年第54期；《对发国难财者征收战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时事类编》1940年第57期；《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币》，《战时经济论文集》，作家书屋，1945，第299页。

Republic of China has failed to reflect the id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some places represented by the Beijing have not strictly follow the legislation whe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iciary and arbitration, but supported arbitration in many ways, resulting in good effectiveness of the adjudication system. A systematic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iciary and arbitr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s still of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iciary and arbitration at present.

Keyword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Judiciary; Support Arbitration; Beijing Commercial Arbitration Office

The Public Opinion Image of the Soviet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System in China in the 1930s
Yan Shuqin

Abstract: The Soviet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system formed a distinct positive public opinion image in China in the 1930s. Through the public opinion image, we can see that Chinese press circles at that time have understood deeply and systematically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Soviet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system.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China's national crisis and economic crisis after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Chinese press circles saw the strong contrast between Soviet Union's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ist countries' severe economic crisis, from admiring Soviet Union's supernormal rapid economic growth, advocated to learn the Soviet Stalin economic model. Chinese press circles' admiration for the Soviet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system is mainly based on the utilitarian motive of learning Soviet Union's experience to realize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overcome China's national crisis.

Keywords: The Soviet; Planned Economy System; China's Public Opinion

The Discussion on Wartime Conservation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Economics in 1938
Sun Qinmei

Abstract: The Temporary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passed the "Emergency economic plan" and proposed "practicing strict economy" as one of the seven major economic policies during extraordinary tim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ubsequentl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ssued "The Outline of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Plan", decided to promote the nationwide conservation movement. This important measure attracted public attention and extensive discussion among economists. A large number of economists applied economic theories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wartime conservation, attempting to seek solutions to China's wartime economic problems. Their concept of conservation differs from the advocates in many aspects, which leads to a debate between "politics" and "academe" in the field of

conservation theory. Nevertheless, the wartime conservation theory of the economist adopted and absorbed by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a certain extent, becoming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wartime economic policies and promote conservation movement.

Keywords: Total Resistance; Conservation Movement; Ma Yinchu; Economic Control

An Overview of Labor-Capital Relations in the Occupied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ian Tong

Abstract: It should be a new attempt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o restate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labor-capital relations in the occupied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logic that the Japanese puppet regime is bound to perish.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adop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aking national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to consideration), two political plates (the Japanese puppet regime in North China and the territory administered by the Wang Puppet regime), and three analytical levels (labor-capital relations are not only production relations, but also social relations, and even more political relations). It is proved that the “national contradiction” aroused by the Japanese puppet regime in North China and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 strengthened by the Wang puppet regime are interwoven, which directly leads to the “social” disorder in the north and south occupied areas.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has been reborn precisely in the period of the deepening of the two major contradictions.

Keywords: Enemy-occupied Area; Labor-capital Relations; Japanese Puppet Regime in North China; Wang Puppet Regim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History Studie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Nanbu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Chen Xinli Hu Xuejun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modern Chinese school education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educational reforms of new polici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set up education exhortation office in various provinces,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mplemented a school district system, and promoted modern school education to the grassroots. On the one hand, the school directors of each school distric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academic and political tasks of improving old private schools, establishing new style schools, preparing new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ducation resources. On